

林慶彰 主編

中國學術思想研究 輯刊

花木蘭
文化出版社
出版

中國學術思想

研究輯刊

八 編

林 慶 彰 主編

第 24 冊

天理與人欲之爭
——清儒揚州學派「情理論」探微（上）

張 曉 芬 著



花木蘭文化出版社

國家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資料

天理與人欲之爭——清儒揚州學派「情理論」探微（上）／張曉芬 著 — 初版 — 台北縣永和市：花木蘭文化出版社，2010
〔民 99〕

目 4+208 面：19×26 公分

（中國學術思想研究輯刊 八編：第 24 冊）

ISBN：978-986-254-208-8（精裝）

1. 清代哲學 2. 儒學

127.015

99002462

ISBN - 978-986-2542-08-8



中國學術思想研究輯刊

八 編 第二四冊

ISBN：978-986-254-208-8

天理與人欲之爭——清儒揚州學派「情理論」探微（上）

作 者 張曉芬

主 編 林慶彰

總 編 輯 杜潔祥

出 版 花木蘭文化出版社

發 行 所 花木蘭文化出版社

發 行 人 高小娟

聯絡地址 台北縣永和中市路五九五號七樓之三

電話：02-2923-1455／傳真：02-2923-1452

網 址 <http://www.huamulan.tw> 信箱 sut81518@ms59.hinet.net

印 刷 普羅文化出版廣告事業

封面設計 劉開工作室

初 版 2010 年 3 月

定 價 八編 35 冊（精裝）新台幣 58,000 元

版權所有・請勿翻印

天理與人欲之爭
——清儒揚州學派「情理論」探微（上）

張曉芬 著

作者簡介

張曉芬，1971年生，祖籍：浙江省。先後於臺大中文系畢、中正大學中文所碩士畢，今於輔大中文所取得博士學位。研究領域是：清代學術、儒學思想等。曾是景文高中、東南科技大學、國防管理學院暑期作文班、陸軍高中等專（兼）任國文教師，今是陸軍專校國文專任助理教授。任職軍校期間，數次榮獲國防部、陸總部與校內優良教師等獎。於期刊論文研討會等發表不下二十篇。如有：〈憂患九卦的道德哲理研究〉、〈《郭店楚簡》「性自命出」的反善之道〉、〈《詩經》「禽鳥詩」的倫理觀探究〉、〈試論〈易傳〉與〈中庸〉「誠德」的實踐〉、〈試從《蘇氏易傳》「思無邪」探究其「性命之學」〉、〈試論錢穆的經學致用之道——從其對龔自珍之評論談起〉、〈清初聖人學實行——試論孫奇逢「戒心生」的修養工夫〉、〈公與私的詮衡——試論俞正燮「人權平等」思想〉、〈屈萬里先生的學識與為人〉等文。並參與八二三砲戰五十週年史政論文徵集與古寧頭大戰六十週年史政論文徵集先後榮獲「優等獎」（全國第二名）與「佳作獎」。

提 要

清乾嘉以後，朝政漸趨衰敗，知識份子愈發自覺改革，除了西力東漸的刺激外，我們知道，最主要的轉折，則是清儒思想的轉變。這個變遷過程，據余英時先生論述，可謂「儒學內在理路」的「變化」。關鍵人物——戴震（1724～1777），則是中國在邁向現代化過程中，使儒學從長期以來偏重的「形上價值」，轉向了「經驗價值」的思想變革者。然其最重要的影響，還在於後繼者的闡揚，這股綿延不絕的汨流——「揚州儒學」，將其思想傳衍散播，似乎已為封建的中國，將走向「民主」的新生，埋下「因果」的種子。揚州學者對後世影響，不可謂不多矣。是以本博士論文：「天理與人欲之爭——清儒揚州學派『情理論』探微」旨在探究：「清代揚州儒學」的「義理思想」；這股「義理思想」抑或承襲「戴震」的「情理論述」，抑或加以改變摻以己見，抑或融會貫通而有所創新，或者，自創新義？然不可諱言，他們皆正視「情欲」，肯定人「情欲」的重要性，強調「養情節欲」、「以禮代理」，大異於「存天理，去人欲」之宋明「理學」，對於此，學者紛紛指出此是一由「天理」轉向「情理」之論述，也是「理學」變向「禮學」的義理思想；然究竟「清代揚州儒學」的「情理」論述如何？他們在學術上所佔有的「承先啟後」的地位又是如何？又對後世影響有哪些？其「情理論述」的評價為何？諸如此類問題，皆是本論文所欲探究的，是以針對「清代揚州儒學」的「情理論」作一探微。

首先，第壹章「緒論」部分，提出「研究動機與目的」、「研究範圍與方法」、「文獻檢討」、「研究步驟」等四個主題探索。在「研究步驟」上，第貳章先界定「清代揚州儒學」的「代表人物」，並探究「情理論的形成」，進而第參章「橫向剖析」，分別就「人性論」——「性理探討」、「經驗界的落實」——「情欲探討」、「實踐工夫」——「化情為理實證工夫」等主題探究。欲將揚州學者共有觀點作一整理歸納以呈現出。接下來，「縱向論述」——就揚州清代儒學「情理論」的發展作一探究，然這方面，依時間先後順序將代表學者排序列出，發現頗多，是以分別就第肆章與第伍章探究。縱橫論述後，則是第陸章探究「揚州清代儒學情理論」的「影響」。這方面非常多，但至今鮮為人完整研究與論述。據個人研究，發現重要影響有：一、「相人偶」的「仁學」傳播。二、古文經學家傳衍與今古文之爭學術流變。三、禮教重整，婦女解放之聲浪高漲。四、書院風尚不變，江浙嶺南漢學大盛。第柒章，則是對「揚州清儒情理論」作一評析。針對其價值、特色、優缺點作論析。第捌章，結論。



目

次

上 冊

第壹章 緒 論	1
第一節 研究動機與目的	1
第二節 研究範圍與方法	10
第三節 前人研究成果回顧	17
第四節 研究步驟（論文章節要義）	28
第貳章 清儒揚州學派「情理論」的緣起與形成	33
第一節 清儒揚州學派的緣起	33
一、外緣環境影響——學術環境的發展	36
二、內緣因素牽繫——宗親學友的傳承與互動	39
三、「通儒」意識的學術群體之展現	48
第二節 清儒揚州學派情理論的形成	65
一、儒家「情理論」的界定與轉變	66
二、「存天理，滅人欲」的反動思潮	72
三、「情理論」闡揚與衍續	81
第參章 橫向剖析——清儒揚州學派「情理論」的 內在理路建構	95
第一節 人性論述——性理探討	95
一、性——血氣心知	99
二、好惡爲性，能知故善	103
三、以禮代理	107
四、情欲不爽失謂之理	112
第二節 經驗界落實——情欲探討	115

一、情——實也	115
二、以情旁通，推己及人	118
三、欲發乎情，緣於性，乃制禮之源	120
四、以禮養情節欲	125
第三節 實踐工夫——化情爲理的實證工夫	127
一、重學習，多讀書	128
二、習禮爲行仁之方	132
三、絜矩力行，聖賢之道	137
四、修身在改過，改過以變通，變通以時行	139
第肆章 縱向論述——清儒揚州學派情理論的發展（一）	145
第一節 「天理」向「情理」的過渡者	145
一、朱澤澐情理論探索	145
（一）學者傳略	145
（二）朱澤澐情理論	146
二、王懋竑情理論探索	149
（一）學者傳略	149
（二）王懋竑情理論	150
三、劉台拱情理論探索	153
（一）學者傳略	153
（二）劉台拱情理論	154
四、小結	156
第二節 「漢學爲尊」的情理論者	157
一、段玉裁情理論探索	157
（一）學者傳略	157
（二）段玉裁情理論	158
二、王念孫情理論探索	160
（一）學者傳略	160
（二）王念孫情理論	161
三、江藩情理論探索	166
（一）學者傳略	166
（二）江藩情理論	167
四、黃承吉情理論探索	176
（一）學者傳略	176
（二）黃承吉情理論	177

五、小結	186
第三節 現實關懷的情理經世者	187
一、汪中情理論探索	187
(一) 學者傳略	187
(二) 汪中情理論	188
二、汪喜孫情理論探索	194
(一) 學者傳略	194
(二) 汪喜孫情理論	195
三、小結	207

下 冊

第伍章 縱向論述——清儒揚州學派情理論的發展(二)	209
第一節 光大「戴震」情理思想者	209
一、凌廷堪情理論探索	209
(一) 學者傳略	209
(二) 凌廷堪情理論	211
二、焦循情理論探索	221
(一) 學者傳略	221
(二) 焦循情理論	223
三、阮元情理論探索	249
(一) 學者傳略	249
(二) 阮元情理論	252
四、劉寶楠情理論探索	272
(一) 學者傳略	272
(二) 劉寶楠情理論	273
五、劉師培情理論探索	280
(一) 學者傳略	280
(二) 劉師培情理論	281
六、小結	284
第二節 春秋學情理論者	286
一、凌曙情理論探索	286
(一) 學者傳略	286
(二) 凌曙情理論	288
二、劉文淇情理論探索	290
(一) 學者傳略	290
(二) 劉文淇情理論	291

三、劉毓崧情理論探索	298
(一) 學者傳略	298
(二) 劉毓崧情理論	300
四、劉壽曾情理論探索	304
(一) 學者傳略	304
(二) 劉壽曾情理論	305
五、小結	310
第陸章 清儒揚州學派情理論的影響	311
第一節 「相人偶」之「仁學」傳播	312
第二節 古文經學家傳衍與今古文之爭學術流變	317
一、古文經學家傳衍	318
二、今古文之爭學術流變	329
第三節 禮教重整，婦女解放之聲浪高漲	338
一、婦女禮教禁錮之反省	338
二、批判禮教的小說，大受歡迎	350
第四節 書院風尚改革，江浙嶺南漢學大盛	362
一、江浙學風丕變，人才輩出	362
二、學海堂建立，開啓清末嶺南文化新風	364
第柒章 清儒揚州學派情理論的評析	371
第一節 價值特色	371
一、傳統解放，義理轉型	374
二、社群人我間之觀照與強調	380
三、「公與私」意義之轉變	384
四、促使人文精神昂揚與人權主義覺醒	394
第二節 評論優缺點	400
一、清儒揚州學派情理論的優點	400
(一) 具有實事求是的科學精神	400
(二) 見解創新變通，思治流派之偏	406
(三) 重視實際，經世致用	414
二、清儒揚州學派情理論的缺點	420
(一) 缺乏「人實踐主體性」論述	420
(二) 強調「禮教」反形成「以禮殺人」	425
(三) 缺乏清晰的「道德概念」無法將「道德義理」充分表達	430
第捌章 結 論	435
參考書目	447

第壹章 緒 論

第一節 研究動機與目的

一、研究動機

清二百七十年的學術約可分為初、中、晚三期。尤以中期的乾嘉學術最能代表清學特色。乾嘉學術基本上是以經史考證為主，從而衍生出訓詁、聲韻、名物、度數、校勘、目錄、及天文、歷算、地理等專門學科。而歷來學者對清乾嘉學術研究，似乎亦皆以所謂的經史考證為主。以為乾嘉時期無思想性可言，所謂「有考據無義理」也，〔註1〕如民初學者熊十力先生（1885～1968）曾云：

清儒反對高深學術，而徒以考據之瑣碎知識為尚，……不知措意於社會、政治與文化方面之大問題，而但為零碎事件之搜考，學者相習成風，而成為無頭腦之人。〔註2〕

此熊氏以為清代考據家不知關懷社會、政治與文化等問題，僅著意於零碎的

〔註1〕張麗珠先生：〈關於乾嘉學術的一個新看法〉所強調：「學界長久以來對於清代學術『有考據無義理』的偏見……」，《清代新義理學——傳統與現代的交會》，（臺北：里仁書局，2005年8月），頁1。

〔註2〕見熊十力先生《十力語要》，（臺北：明文書局，1982年10月），卷2，頁277。另其《讀經示要》亦云：「心性之學，所以明天人之故，究造化之原，彰道德之廣崇，通治亂之條貫者也。此等高深學術，云何可毀？」（臺北：明文書局，1987年7月），頁451～452。

考據，而成為無頭腦之人。其後熊氏大弟子——牟宗三先生（1909～1995）亦以此無思想內容，無講述的必要；其云：

我們講中國的學問，講到明朝以後，就毫無興趣了。這三百年間的學問我們簡直不願講，……。〔註3〕

牟先生不願講此時段的學問，蓋以為清儒不太講心性之學，所以沒有講述之必要。此外，牟先生同門：徐復觀先生（1903～1982）亦以為乾嘉學者沒有經學思想。〔註4〕然真是如此乎？據錢穆先生（1895～1990）《中國文化史導論》云：

中國文化本來就處在不斷進取變動之中。其變遷經過分四階段：其一是上古至秦……其二是漢唐時期……其三是宋明清時期。中國人個性精神進一步發揮，中國文化充分發展。這是中國文化的個性發展期。其四是清以後時期。這個時期中國民族共通精神與個性精神已經安排周到，所要做的是如何將精神與物質同一融合，進而關心周圍物質環境，儘量改善和利用它，以協調精神與物質的關係。〔註5〕

可見錢賓四先生所論不同。其以為中國文化是不斷在變化發展的，尤其在宋明清時期，更是中國人個性精神之昂揚，至清以後，則是講究天人如何合一？關心生存環境之如何改善？以求精神與物質之融合。所以乾嘉時期學者真的無思想可言？真的只在故紙堆考證中求生活？其實不然。據張壽安先生研究，指出：

事實上，乾嘉時代絕大多數考證學者固然儘量避免對思想作純粹形上的討論，但仍有部分具思辨興趣的學者，從學術源流和經世的角度重新檢審儒學之「道」、「理」和思想問題，認為儒學自有其傳統的、非抽象性質的「道」；並不囿於考證，亦不只囿於理學內部心性理氣的辨析。這種新的通經求「道」的趨勢，證明清代儒學具有與宋明理學不同的思想典範（paradigm）。〔註6〕

知乾嘉學者不囿於理學內部心性理氣之辨析，而是著重從經世致用角度，實學實證的方法，探究儒學的「道」或「理」。不然，為何有清儒主張「故訓非

〔註3〕 牟宗三先生：《中國哲學十九講》，（臺北：臺灣學生書局，1983年10月），頁418。

〔註4〕 氏著《中國經學史的基礎》云：「無思想的經學家，乃出現於清乾嘉時代。」（臺北：學生書局，1982年），頁51。

〔註5〕 錢穆先生：《中國文化史導論》，（台北：正中書局，1969年），頁162。

〔註6〕 張壽安先生：〈緒論〉，《以禮代理——凌廷堪與清中葉儒學思想之轉變》，（臺北：中研院近史所，1994年5月），頁1。

以明理義，而故訓胡爲？」或者主「訓故明乃能識義文周孔之義理」，〔註7〕以見「清學無義理」是不正確的觀念。是故張麗珠先生以爲「殊不知乾嘉新義理學正是完成儒學『兩種義理類型』——除了理學的道德形上學以外，另以主於發揚『經驗面價值』、姑名爲『情性學』的經驗取向義理學重要功臣。」

〔註8〕

近來學界除了討論清儒考證學外，對乾嘉學者之義理學，亦是逐漸闡揚與益發重視的。正如林慶彰先生所云：

在求通經致用的過程中，逐漸發展出以典章制度的重建來重整政治、社會秩序的新學問。這種學問是以前學者因對乾嘉學者存有偏見而忽略的，現在應該把它發掘出來。〔註9〕

或許乾嘉學者的義理學並非形上的心性理氣論，而是一種所謂「經驗領域義理學」。〔註10〕所以當時焦循（1763～1820）曾云：他們的「義理」，「非宋儒之義理」。〔註11〕余英時先生亦指出：研究清代的儒學思想，必須對儒學採取一種廣闊而動態的看法，如果固執著心性理氣的單一儒學思想內涵去衡度清代儒學，只怕是緣木求魚南轅北轍了。〔註12〕然究竟乾嘉「經驗領域」之義理學是一種什麼樣貌的思想？什麼內涵的哲理？

據個人對乾嘉考據皖派大儒——戴震（1723～1777）研究，發現他不僅是「實事求是」的考據大家，更是提出一套迥異於宋明理學的哲學家。此所謂「戴震哲學」，依梁啟超先生研究，乃是所謂的「情感哲學」。〔註13〕然其哲學理論

〔註7〕前者見戴震：〈題惠定宇先生受經圖〉，《戴東原先生全集》，（台北：大化書局，1987年），頁1114；後者見焦循：〈寄朱休承學士書〉，《雕菰集》，（台北：鼎文書局，1987年），頁203。

〔註8〕同注1，氏著〈關於乾嘉學術的一個新看法〉，頁1。

〔註9〕林慶彰先生：〈清乾嘉學者對婦女問題的關懷〉，收入林慶彰先生、張壽安先生等編《乾嘉學者的義理學》上冊，（臺北：中研院文哲所，2003年2月），頁214。

〔註10〕此「經驗領域義理學」乃張麗珠先生對乾嘉義理學之命名，參見氏著《清代義理學新貌》〈自序〉，（臺北：里仁書局，1999年5月），頁2。

〔註11〕焦循：〈申戴〉，原文是：「東原得之義理，非講學家西銘太極之義理也。」《雕菰集》卷七，（台北：鼎文書局，1977年），頁95。

〔註12〕余英時先生：〈自序〉，《論戴震與章學誠》，（香港：龍門出版社，1975年），頁1。

〔註13〕梁啟超先生云：「《疏證》一書，字字精粹，……綜其內容，不外欲以『情感哲學』代『理性哲學』。」《清代學術概論》，（臺北：里仁書局，1995年），頁38。

並不見重於當世，〔註14〕誠如侯外廬先生所云：戴震學說在當時並未成為支配的學說，沒有起著社會影響，因而歷史價值也是有限的。〔註15〕但問題是「戴震哲學」就因此蕩然無存乎？實不然也，殊不知後續闡述者竟連綿不絕，如：四庫館總纂修之紀昀（1724～1805）、史學大師錢大昕（1728～1804）、揚州學派的汪中（1744～1794）、孫星衍（1753～1818）、凌廷堪（1757～1809）、焦循（1763～1820），與著《鏡花緣》的李汝珍（1763～1830）、阮元（1764～1849）、俞正燮（1775～1840）、包世臣（1775～1855），乃至同治時的黃式三（1789～1862）、力主今文經學以圖強救國的龔自珍（1792～1841）等等學者（略依時代先後排列），都有相關著作與論述。〔註16〕頗令人玩味的是：在這些學者當中，尤以揚州學派學者居大多數，他們除了主要成就在考證名物、訓詁、典章制度等方面外，更是兼融吳派之「專」，皖派之「精」，頗具「能創、能通」的特色獨步清代學壇。〔註17〕在思想上如焦循主「能知故善」說；阮元強調「相人偶」仁學；凌廷堪倡「學禮復性」與「制禮節性」。〔註18〕均顯示「戴學」的傳承與發揚的鎖鑰，實與揚州學派的義理思想有密切關係。又據張麗珠先生指出：中國在邁向現代化時，儒家思想能順利從傳統價值之封建、專制、保守型態轉向現代化的現實、功利、自由、個人主義的內在啓蒙者，除了西方思潮的刺激外，亦與「乾嘉義理學」產生有關。〔註19〕那麼，吾人是否可以這麼說：興起於19世紀末，20世紀初的「反禮教運動」，其萌動實源自18世紀，而策動此一批判

〔註14〕如戴氏門生洪榜：〈與朱筠書〉云：「《孟子字義疏證》……然則非言性命之旨也，訓故而已矣！度數而已矣！」又朱筠亦云：「可不必載，性與天道不可得聞，何圖更於程朱之外復有論說！戴氏可傳者不在此。」見江藩著、錢鍾書先生主編：《漢學師承記》（外二種），（香港：三聯書店，1998年），頁117、119。

〔註15〕氏著：《中國思想通史》，（北京：人民出版社，1956年），頁462。

〔註16〕許蘇民先生：《戴震與中國文化》第八章至第九章均有相關論述，（貴陽：貴州人民出版社，2000年10月），頁195～288。

〔註17〕張舜徽先生：〈揚州學記第八〉，《清儒學記》，（濟南：齊魯書社，1991年11月），頁378～379。

〔註18〕焦循：〈性善解三〉：「性何以善？能知故善。」同注11，頁127；阮元：〈《論語》論仁論〉：「云竊謂詮解『仁』字，……鄭康成注『讀如相人偶之人』，數語足以明之矣。」《學經室一集》卷8，（北京：中華書局，1993年），頁283；凌廷堪：〈復禮上〉：「非禮，何以復其性焉？」、〈好惡說上〉：「先王制禮以節之，懼民之失其性也。」王文錦點校《校禮堂文集》卷4、卷6，（北京：中華書局，1998年），頁237、頁367。

〔註19〕整理自張麗珠先生：〈關於乾嘉學術的一個新看法〉，同注1，頁3。

的思想原動力，毫無疑問是「情」與「私」？〔註20〕

而「乾嘉義理學」之所以能廣傳於後，使得儒家思想與現代化模式能順利接軌，從形上價值跨越到經驗價值的轉型，其內在理路的關鍵，其幕後推手，我們是否不可忽略：戴學之後揚州學者的「義理思想」的發展？若依思想模式的發展是否是：戴學——揚州學派——常州今文學——湖湘學派？〔註21〕畢竟思想的演變，絕非一蹴可幾的，它必然要根基在對過去思想的繼承、蛻變和改造上，必定要經過長時間，累積了足夠的「量變」之後，才能夠達到轉型之「質變」。〔註22〕若依「量變」與「質變」兩大標準來看，我們似乎可以發現到：在上述學者中，惟揚州學派學者同時兼具，因在清代中前期，揚州即以「學者」眾多而著稱於世。又加上其不再拘守漢學考據一途，而轉向富有「既通且博」與「求變求新」〔註23〕的開創理路治學，所以在傳統儒學與現代化思維的銜接點上，「揚州義理學——情理論」想必扮演重要的角色。黃愛平先生云：

長期以來人們論及乾嘉漢學的流派時，大都僅只劃分為吳派和皖派，卻忽略了有輝煌成就的揚州學派。其實，揚州學派，既繼承了吳、皖兩派的特點，又發展和超越了兩派，形成了自己獨特的風格，頗有些近代氣息，成為清代學術思想發展史上具有承上啓下作用的一個環節，是值得認真加以研究的。〔註24〕

「揚州學派」既是如此重要，然其思想內涵究竟如何？若是承襲戴震學說的話，究竟哪些觀點承襲其說，哪些觀點創新？還有「揚州學派」是如何產生的？這些都是值得探討的。

據趙航先生等人研究，可以發現到原來最早提出「揚州學派」這個名詞

〔註20〕張壽安先生：〈自序〉，《十八世紀禮學考證的思想活力——禮教論爭與禮秩重省》，（北京：北京大學，2005年），頁IV。

〔註21〕此思想脈絡，來自田漢雲先生：〈關於進一步確認揚州學派的思考〉一文，提及揚州學派的沒落所啓發而來的，文中甚云：「道咸之交，由於社會政治發生劇變，以漢宋兼容為主要特徵的湖湘學派，成為新的學術中心。……此時的揚州學術畢竟缺乏活力，降為湖湘派的附庸。」林慶彰先生、祁龍威先生等編：《清代揚州學術研究》（上），（台北：學生書局，2001年5月），頁135。

〔註22〕同注1，頁6。

〔註23〕此「通博」特色見張舜徽先生：〈揚州學記第八〉而來，同注17，頁379；而「創新求變」特色見支偉成：《清代樸學大師列傳》卷六，（湖南：岳麓書社，1998年1月），頁145。

〔註24〕黃愛平先生等著《清代學術與文化》第六章：揚州學派及乾嘉學派評價，（瀋陽：遼寧教育出版社，1993年），頁356。

的，首推「方東樹」。在方書中提到的揚州學者有朱澤澐、焦循、汪中、阮元、王念孫、王引之、江藩、劉台拱等。但，方氏對他們所採取的態度並不相同。〔註25〕梁啟超先生（1873～1929）《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亦提及，且有意識將清代漢學家分成三派，即吳派的惠棟，皖派的戴震，而揚州學派的領袖則屬焦循、汪中。〔註26〕然首先較清楚為揚州學派下定義的是張舜徽先生，其《清代揚州學記》更進一步指出：戴氏的哲學思想與治學道路，幾乎全為揚州諸儒所繼承與發展。且此哲學思想不僅彌補了十八世紀中國學術思想界晦塞的一面，同時它也是唯一繼承戴震之後，給宋明唯心主義的理學以嚴厲的批判。〔註27〕又：像汪中、焦循、阮元都能大膽地對一些問題，特別是對倫理思想的問題，提出自己的看法。〔註28〕為何張舜徽先生會這麼說？是否揚州學者在義理思想方面真的頗有獨到之處，或者有某些議題值得進一步探究？所以乾嘉吳皖二派與揚州學派的關係與區隔，是首須釐清的，不可否認，戴震的新義理學在揚州學圈獲得最大的迴響與發展，已是學界上公認的事實，然自戴震以下焦循、汪中、阮元以至凌廷堪，他們的義理思想為何？如何承襲戴震的情欲哲理而將之發揚光大？是否有其哲學思路可尋？又如何「從理到禮」？這個中的轉變是什麼？他們所倡「以禮代理」等哲理對後來近現代學術上，有何影響？他們的學術主張，與後來儒學的改變，有無關連？

〔註25〕方東樹：《漢學商兌》曾兩度談及揚州學派，其云：「汪氏既斥《大學》，欲廢『四子書』之名，而作《墨子表微序》，……此等邪說，皆襲取前人謬論，共相簧鼓，後來揚州學派著書，皆祖此論。」（卷上之中）；另則「揚州汪氏，謂文之衰自昌黎始。其後揚州學派皆主此論，力詆八家之文為偽體。」（卷下），（香港：三聯書店，1998年），前頁291，後頁384。趙航先生：《揚州學派新論》〈引言〉亦論及，（江蘇文藝出版社，1991年11月），頁14。又張壽安先生：《清代揚州學派研究展望》，文中且云：「可見方東樹認為的『揚州學派』絕不等同於『揚州學者』。方氏在《漢學商兌》卷中批駁汪中關於《四書》次第的論述……看來是不滿汪中以下的揚州學者皆疵詆朱子《四書》；但相對的，我們卻明顯看出揚州學者在義理學上的新走向就是反省並擺脫程朱性理而另覓新解。」（《漢學研究通訊》第19卷第4期，2000年11月），頁620。另外，龔鵬程先生：《清朝中葉的揚州學派》一文亦云：「揚州學派……首次如此指稱的，是方東樹。」林慶彰先生、祁龍威先生等編《清代揚州學術研究》，（臺北：學生書局，2001年4月），頁49。

〔註26〕梁啟超先生：《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台北：里仁書局，2002年），頁31。

〔註27〕張舜徽先生：《清代揚州學記》，（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62年），頁380～381。

〔註28〕同上注，頁380。

若有，是發生何種改變？諸如此等問題皆是本論文所欲探究的。

然觀察當今學術界，對揚州學者的單篇論述頗多，而碩博士論文多僅對各別學者著作作研究，於揚州學者的義理思想至今仍無一系統、整合、宏觀的研究。正如王俊義先生所云：目前對於揚州學派研究，大多屬於有關揚州學派學者的「個案研究」，如與揚州學派所涵蓋的豐富內容相較，研究深度、廣度，都尚屬初始階段。還缺乏從「總體上」對該學派進行深入、系統論述。〔註29〕楊晉龍先生〈臺灣學者研究「清乾嘉揚州學派」述略〉一文亦指出：以「揚州學派」為主體之研究畢竟有限，更多是個別「揚州學派」學者的研究。〔註30〕對於揚州儒學主要內涵與其在整個學術史上地位與影響，則是乏人問津；誠如漢宋的理、禮爭辯，理與情之安頓，禮與情之調和等議題，至今學界上仍未有精細的研究出現。又其中客寓揚州的凌廷堪，是否算是揚州學者？又其主以禮代理，其思想的淵源、形成與傳承之發展究竟如何？對後世的影響又是為何？又阮元的「相人偶」的「仁學」為何影響到晚清譚嗣同的「仁學」思想？又焦循的「習禮格」的禮學觀點為何？又為何傳統儒學會走向現代新儒學？其中轉變的「內在理路」是什麼？又禮教之改革，如婦女不再纏足與殉節等等，究竟這些揚州清儒們的主張是否是傳統禮教變至禮教解放的關鍵或啟蒙之源？抑是晚清維新思想之來源？諸如這些問題，都是本論文所欲探究的，是以本論文定題為：天理與人欲之爭——清儒揚州學派「情理論」探微。

二、研究目的

揚州——一個具有悠久歷史與燦爛文化的名城。唐以來，「揚一益二」，「煙花三月下揚州」，「十年一覺揚州夢」，揚州成為富庶、繁榮的象徵，蔚為歷代騷人墨客吟咏讚譽的美麗之城，有著「淮左名都」之美譽。〔註31〕至清代，揚州再度成為中國重要的食鹽供應地與南北漕運的咽喉，曾為歷史學家譽為「落日輝煌」。〔註32〕以見當時「揚州」是南通北往運輸交通上重要的城市。

〔註29〕 王俊義先生：〈關於揚州學派的幾個問題〉，《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生院學報》，2003年第3期，頁71。

〔註30〕 楊晉龍先生：〈臺灣學者研究「清乾嘉揚州學派」述略〉，《漢學研究通訊》，2000年11月，頁2。

〔註31〕 此淮左名都之說見於姜夔：〈揚州慢〉：「淮左名都，竹西佳處，解鞍少駐初程。」朱孝臧輯《宋詞三百首箋》，（台北：廣文書局，1960年7月），頁283。

〔註32〕 桑光裕先生：〈文化的魅力——揚州歷史文化叢書總序〉，朱正海先生主編：《揚

畢竟她悠久的歷史造就其燦爛輝煌的「揚州文化」，在學術史上是無法被抹煞的。

歷來對「揚州文化」研究頗多，如：「揚州八怪」、「揚州瘦馬」、「揚州十日談」乃至其園林建築、亭台樓閣、飲食、茶酒、戲劇、金石、銘文、書法、謠諺等，都是歷界學者們趨之若鶩，爭相研究的主題，但可怪的是「揚州學派」的情理思想卻是乏人問津。〔註33〕殊不知「揚州學派」亦是其文化之一，

州歷史名人》，（揚州：廣陵書社，2003年11月），頁1。

- 〔註33〕「揚州文化」這方面前人研究成果頗多，據個人查閱國內（台灣）碩博士論文，大多偏向研究其書法、繪畫與文學方面，又尤以研究鄭板橋、金農者為多，這方面計有十一本論文；如孫紅郎：《金農繪畫的研究》，台北：文化大學藝術所碩論，1980年；衣若芬：《鄭板橋題畫文學研究》，台北：臺大中文所碩論，1989年；程君耦：《明末清初的揚州畫壇與遺民畫家》，台北：臺灣師大歷史所碩論，1990年；朴順德：《十八世紀中國文人畫思想之研究——揚州八怪與朝鮮後期繪畫發展之比較探討》，台北：文化大學藝術所碩論，1993年；朱祖德：《唐代淮南道研究》，台北：文化大學史學所碩論，1996年；陳瑋琪：《鄭板橋文藝理論及詞作研究》，台中：中興大學中文所碩論，1999年；李心怡：《唐詩中的揚州形象》，台北：政大中文所碩論，1999年；高明一：《清代金石書法入畫——研究趙之謙花卉畫的歷史意涵》，台北：藝術學院美術所碩論，1999年；全璿珠：《鄭板橋繪畫研究》，台南：成大藝術所碩士論文，2001年；徐圓貞：《李白詩作之旅遊心理析論——以揚州系列的傳記論述為例》，嘉義：南華大學旅遊事業管理所碩論，2001年；巫素敏：《枝葉關情——論鄭板橋墨竹書畫之一致性》，台北：文化大學藝術所碩士在職專班論文，2002年；張致宥：《金農書法研究》，台中：中興大學中文所碩士在職專班碩論，2002年；蔡麗芬：《金農書法藝術研究》，屏東：師範學院視覺藝術所碩論，2002年；劉家華：《金農書法風格研究》，新竹：師範學院美術教育所碩論，2003年；金聖容：《金農題畫文學研究》，台中：逢甲中文碩論，2003年；張啓文：《金農、羅聘、黃慎的神佛鬼魅像研究》，中壢：中央大學藝術所碩論，2003年；蔡忻亞：《鄭板橋思想研究》，高雄：師大國文所碩論，2004年；林晉滄：《揚州京華城施工进度問題與解決對策之研究》，台北：中華大學營建管理所碩論，2006年；關於在臺以「揚州學派」為題的博碩士論文則無，惟以「揚州學派」為關鍵詞的論文僅有：繆敦閔：《劉師培〈禮經舊說〉研究》，埔里：暨南國際大學中文所碩論，2000年；曾聖益：《儀徵劉氏春秋左傳學研究》，台北：臺灣大學中文所博論，2004年。就國內的期刊論文與此相關之研究計有四十篇，除了十三篇是有關「揚州學派」的論述外，其餘皆是文化之論述，如曹琳：〈古揚州城的香火與戲劇〉，《民俗曲藝》，2001年3月；陳芳：〈乾隆時期揚州鹽商之「內班」初探〉，《國文學報》，2001年6月；張致宥：〈揚州八怪書畫美學探究〉，《臺中技術學院人文社會學報》，2002年12月；黃士榮：〈隋煬帝的運河與江都建設——一個將文化與政治合一的企圖〉，《新北大史學》，2004年10月；李孝悌：〈士大夫的逸樂——王士禛在揚州〉，《中研院歷史語言所集刊》，2005年3月；蘇芳宇：〈不負廣陵春：物種爭議與書